

试

论

邓国故址的空间形态和历史价值

□ 崔新社

邓国故址位于湖北省襄樊市樊城西北约 6 公里处,现为高新技术开发区余岗乡邓城村所辖,邓国故址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南接汉水北岸冲积平原,东有小清河、唐北河,西北为绵延的低矮丘岗地。其遗址范围以南阳盆地以南 6 公里的邓国故址为中心,在高新开发区域 6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广泛分布。故址根据性质可分为故城遗址、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三部分。

故城遗址^[1]为该区域中心遗址,现保存基本完好,该城地面略呈方形,系夯土所筑。东、西、南、北分别长 766 米、713 米、896 米和 858 米,城垣底宽约 10~15 米,残高 2~5 米,面积 0.64 平方公里。四角突出,每面城墙中部开门,北城门外侧尚存向外突出数米的土坡,据专家考证,属瓮城的设施。据墙体夯土内发现的遗物残片分析,现有墙体在汉魏时期曾进行过整修,至今城址的轮廓仍十分清晰。城外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河宽 18~35 米。东、西河段分别利用黄龙沟和普陀沟而修。除南、北城河部分河段保存较好外,其余均淤积成田。城址的始建年代不详,单从城墙暴露的遗物看,该城至少从春秋一直延用到南北朝时期。邓国故址内目前除南边小部分为村民居住区外,大部分为耕地,地面暴露有较多的东周至汉代的器物残片以及少量南北朝时期的残瓷片。

黄家村遗址^[2]发掘地最近处距邓国故址东城墙约 1 公里,分布范围东西长约 15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文化层因早年平整土地破坏严重,主要清理了一些灰坑和点状分布的文化层,其时代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早期,且自西向东由早到晚分布,出土器物非常丰富,文化层次分明,其堆积分为三层,上层遗迹为春秋早、中期,下层为邓文化遗存。

韩岗遗址^[3]位于邓城城垣北侧 350 米处,是邓

城的从属遗址。其分布略呈方形,面积约 1000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2 米左右,襄樊市博物馆和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曾先后对其进行了三次试掘和正式发掘,发掘出东周、秦汉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灰坑、灰沟、水井、陶窑和汉、唐时代的墓葬。出土遗物有陶鬲、罐、盆、豆、筒瓦、板瓦、孟等器物。它是一处分布范围大、文化堆积厚、遗物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韩岗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该区域从春秋中期到西汉早期的文化面貌。对邓国故址及该区域的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周岗遗址^[4]位于邓城城垣东南角外侧,为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台地上,长约 600 米,宽约 170 米,文化层厚约 3~6 米,暴露遗物丰富,采集有石斧、陶纺轮及新石器时代的陶鼎、杯、罐,东周的陶鬲、豆、罐等器物残片。

邓国故址的墓葬区主要在襄樊城区以北汉水北岸的淤积平原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北部矮丘连绵,东部一条南北向低岗纵贯,中部两条东西向矮岗并列,在南北、东西分别 10 公里的范围内,墓葬分布密集,时代基本和邓国故址的兴衰相始终,即从两周时期至南北朝。重要的发现有山湾^[5]、蔡坡^[6]墓地,其位置基本相连,时代前后衔接的两个墓地,已发掘的墓葬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整个邓城区域各时段中,其单个墓葬的规模是相对较大的,墓地规格也相对较高,战国时期设台阶、带墓道的墓葬较多,两个墓地随葬器物中青铜器较多,部分青铜器铸有铭文,其中都、吴、徐、蔡等国青铜器应是作为战利品随葬的,另有春秋晚期的“邓公乘鼎”^[7],则可能就是邓县县公所有。山湾墓地则在椁室内发现车马殉葬。这些都是研究邓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团山墓地^[8]少量墓设有腰坑,发现三座陪棺墓。墓地出土有郑、蓼、蔡等国铭文青铜器。沈岗墓地^[9]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少量

墓葬有打破现象。在沈岗墓地发现邓城区域内至今惟一一座春秋晚期的车马坑,为研究春秋时期邓国故址和探寻诸侯国等级制提供了重要资料。余岗墓地^[10]是发掘最为完整的一个墓地,墓葬分布较有规律,按时代早晚从西依次向南、北、东部逐步扩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出土物也较为丰富,青铜礼器、陶礼器、玉器、漆木器、兵器、日用器等均有出土,余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襄樊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的分期、年代、秦楚关系以及埋葬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另外还有彭岗墓地^[11]、王坡墓地^[12]等发掘了两周时期的墓葬以及邓墓、楚墓、秦墓,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清楚地表明这些墓葬在邓国故址的整个墓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邓国故址的空间范围大致如上所述。在 60 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在漫长的 1300 余年间,邓国古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邓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邓国最早出现在史籍中是在《荆州记》(据《太平御览》)：“樊城西北，有鄆城。……鄆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吴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这是有关古邓国及邓县最早的较明确记载。

根据文献材料记载，邓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媯姓。西周初期，已受封于江汉地区，是周天子的“南土”和重要据点。考古资料表明，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是邓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邓国与姬姓、媯姓、嬴姓、姒姓一些诸侯国有联姻关系。进入春秋后，郑庄公和楚武王的夫人都是邓女，她们并积极参与国家政事，表现出较高的见识和才能，展示了邓国丰厚的文化底蕴。从各地出土的邓国铜器看，其形制、纹饰、铸造工艺和铭文风格各个方面，都体现出较高的水准，并且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这一方面反映了邓国对外广泛交往和联系，同时也说明了邓国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南方诸侯大国。

在周成王时，曾派大臣孟到邓国安抚邓伯（诸侯王国）。周桓王十五年（前 705 年），邓侯吾离到鲁国访问，加强了与中原的联系。周桓王十七年（前 703 年），楚国派往邓国的使者道朔和另一名巴国使者在邓国南境遭到鄆国人的袭击，财物被掠，人被诛杀。楚王闻讯大怒，派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鄆国。邓国知道后则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鄆国，爆发

了“楚巴与邓鄆之战”，经过三次进退，楚巴联军采用前后夹击的战术，才打败邓国，这说明邓国已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这是有史以来发生在襄樊最早的一次战争。春秋早期，楚国欲霸中原，继续向南阳盆地拓展，邓国即为楚国的首攻目标。周釐王四年（前 678 年），邓国终于被楚国灭掉。楚灭邓之后，邓国都城就成为楚之属邑，而邓的文化也就与楚文化合流，从而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并因名置邓县。下至战国，邓城一直是楚境内较著名的城镇和一级行政区。在秦至刘宋近 700 年时间，邓城分别是南阳郡邓县，荆州义阳郡邓县和雍州京兆郡邓县治所在地。这都说明邓县在当时楚国境内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应是和过去邓国留下的悠久经济、文化基础分不开的。对比之下，襄阳在春秋、战国时，还只是汉水上连接南北的一个重要渡口。到西汉时才有襄阳县。到东汉末，樊城才见于史传，三国以下，至东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南北对峙，襄阳形势险要，渐成一方重镇。而邓县则转而与樊城并称“樊、邓”，邓城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削弱，逐步成为襄阳的外围据点。南北之间每有战事，邓县（也称邓城）常是双方必争之地，特别是公元 498 年，北魏孝文帝军队大举南攻，在邓城大败南齐军队，齐军损失很大，邓城也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已渐趋荒废，终于形成现在的邓国故址。

邓国故址创建已有 2500 余年，其毁灭亦有 1000 余年。像这样时代漫长，范围广大而又突然毁弃的都城，特别是城市遗址在毁灭后没有再遭受到大的破坏，在中国大都市遗址中较为少见。邓国故址遗址的保护、发掘和研究，对探讨中国城市布局演变和城建规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1]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资料。

[2] 襄樊市考古队 2005 年资料。

[3]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阳邓城韩岗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2 年第 2 期。

[4] 襄樊市文物普查办公室等《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年。

[5]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 年第 2 期；杨权喜《襄阳山湾出土的郢都和邓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6]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

考古》1985年第1期;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文物》1976年第11期;襄樊市考古队《湖北襄樊蔡坡战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2005年第11期。

[7]杨权喜《襄阳山湾出土的郢都和邓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8]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9]襄樊市考古队2004年~2006年发掘资料。

[10]襄樊市考古队2004年~2005年发掘资料。

[11]襄樊市考古队《襄樊市彭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2期;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市彭岗东周墓群第三次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襄樊市文物管理处等《襄樊彭岗东周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12]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发掘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襄樊市文物管理处)

(上接12页)

大型贵族墓葬,被认为是本地区的一级聚落中心。遗址被研究者分为五期,其中第四期为良渚文化的鼎盛期,绝对年代为4500~4400年。这个时间几乎和良渚遗址群衰落紧密衔接。而墓葬资料中,也是从第四期开始出现普遍随葬玉钺、玉琮、玉璧及生前掌握军政大权和神权的贵族大墓。很有可能良渚贵族带领族群,在故乡难以继时迁移至此。此外良渚晚期与良渚遗址群临近的寺敦、草鞋山、福泉山同时出现大型贵族墓葬恐怕与良渚遗址群衰落之后,良渚贵族向外迁移有关。

过去,对良渚文化衰落的研究有一概而论的倾向。在整个良渚文化区中,各个小的分区都有不同的特点。它们从兴起到辉煌再到衰落并不是同步的。当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发展为整个良渚文化地缘中心时,太湖东部的福泉山、北部的寺敦等遗址还在处于成长期;而当良渚遗址群衰落之后,这些遗址成为自己所处区域内的中心遗址,这恐怕并非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巧合。各遗址的兴废时间有先有后,原因可能相近,也有各自的特殊情况,不能一概与良渚文化最后的衰落挂钩,当然这就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1]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12月。

[2][6][12][15]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3]a 刘方复《中国史前的洪水》,《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b 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4]如: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5]主要参见a 许倬云《良渚文化到哪去了?》,《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b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7]郭凡《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全国大遗址保护资料——陶寺遗址》,2001年1月。

[9]杨国勇主编《华夏文明研究——山西上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a 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b 王华田、袁旭音《江苏小梅岭硅灰石矿床特征及其成因》,《火山地质与矿产》1996年第2期。

[11]贾学德、郑建明《人地关系简论——以环太湖史前的食物结构变化为例》,《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13]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14]张玉兰等《广富林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先人生活环境探析》,《同济大学学报》2002年第30卷第12期。

[1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1年。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